



【天天说钱】

人民币不急于实现自由兑换的根本原因,是汇率高估和国内资产价格泡沫严重。

# 人民币不必急着当“硬通货”

刘晓博

路透社近日报道称,据内部人士透露,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时间表被悄悄推迟,因为政府担心过快放松资本管制将引发投机性资本流动,加剧经济转型的困难。中国一直没有为人民币自由兑换设定严格的时间表,不过2015年年底之前实现“基本可兑换”是一个流传颇广的说法。比如在2000年11月,时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的易纲,曾撰文预测人民币将在2015年实现自由兑换。2011年9月,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经济学家吴晓求都表达过类似观点。而中国欧盟商会主席大卫·库奇诺也曾在2011年9月对媒体表示,他在跟中国官员会

谈时,“中国官员明确表示,人民币将在2015年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不过央行随后予以否认。种种迹象显示,在2015年左右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或曾经被官方讨论过,但没有确定明确的时间表。而且,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随后中国经济发生的变化,让高层重新评估了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条件是否成熟。其实在今年“两会”上,周小川就给出了答案。他说,人民币走向国际化还有很多“家庭作业”没做好;人民币要实现国际化,还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他还表示,要稳步推进和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对于推广人民币使用方面,并不事先安排速度、节奏、时点。这段话传递出一个重要信号:人

民币自由兑换的进程比此前预料的将减慢,也就是说,人民币不急着去当“硬通货”。应该说,这是非常明智的。人民币不急于实现自由兑换的根本原因,是汇率高估和国内资产价格泡沫严重。如果贸然实现自由兑换,中国经济将面临巨大风险。中国人为什么蜂拥到发达国家买服装、化妆品、箱包、手表,仅仅是关税高造成了奢侈品在中国贵吗?没有这么简单,因为很多东西的差价高达四五倍,这里面明显有汇率的因素。英国著名研究机构“朗伯德街研究公司”认为,人民币汇率被高估了约三分之一。至于高估的是不是三分之一,我说不准。但高估显然是事实,这从中国出口企业利润越来越微薄,生存越来越艰难就可以看出。

此外,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价格也明显偏高。房子不用说,北京同样地段写字楼价格是纽约的2-3倍。A股经过暴跌之后,部分上市公司仍然估值偏高;苹果公司的股票如果在中国会是多少倍市盈率?至少40倍吧,但在美国只有16倍;谷歌呢?如果在中国应该跟腾讯差不多,60倍左右,但在美国只有30倍。此外,中国的珠宝、书画、红木家具等领域,都存在严重的泡沫。李嘉诚为什么抛售内地房产?就是因为相比之下,中国的资产太贵,换到欧洲可以赚到很大的差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民币贸然实现自由兑换,资本肯定大量外流。最近两年日渐升温的中国人海外购房潮,就传递出了这种信号。全美房地产经纪协会7月8日发布的报告显

示,2013年4月至2014年3月的一年间,中国人在美购房总额达220亿美元,相比前一年飙升近80%,占外国人在美购房总额的24%左右。如果资本大量外流,会出现什么状况?看看目前的俄罗斯、巴西、阿根廷、智利就知道了。首先是人民币大幅贬值,然后是楼市、股市下跌,收藏品价格一泻千里。人民币贬值后,进口商品价格上涨,能源、食品等日用品价格将明显上涨,通胀加剧。然后被迫加息,这样又打击了实业,失业率上升。总之,那将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急着让人民币成为“硬通货”,还是多想想如何通过改革,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防范和化解风险。(作者为深圳商报编委)



【贾语村言】

敬惜字纸是种非常美妙的情感,这种情感不会因为文化高低存在区别。

# 无人凭吊的报刊亭

贾壮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在一个小县城念高中。在少得可怜的课余时间,很喜欢去两个地方,一个是县城里唯一的一家新华书店,店里的书开架摆放,除了没有座位,跟图书馆区别不大,穷学生可以占到高雅的便宜;另一个是邮政局的书报柜台,在那里能买到心爱的《读者》杂志,这本杂志当时还是月刊,但我几乎每天中午都会去看看有没有来新的,每当拿到新刊,总是不舍得一下子看完,因为下一期要等很久。敬惜字纸是种非常美妙的情感,这种情感不会因为文化高低存在区别。据说宋代的司马光爱书如命,为了保护书籍,专门做了一块板子,看书时将书放在板子上,以减少手与书的接触。我的母亲目不识丁,可她对书籍也

有天然的敬畏,随便捡到一张有字的纸,都要小心地收拾起来,待我回来看看是否重要。不知道生活在电子时代的人们,对于印在纸上的铅字,是否还有爱不释手的感受。记得上大学时,《体坛周报》盛极一时,出报当日,需要早去报摊等候才有可能买到。有个大学同学立志经商致富,大学四年一期不落地购买《中国经营报》,一字不漏地从头读到尾,毕业时报纸已堆满了床铺。书店和报摊是文化产品的零售终端,售卖文化产品的摊贩,总给人一种亲近感。书报是文化产业的根基,书店和报摊对于产业繁荣是有贡献的。知识、文化和思想需要一个物理载体,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载体总是要发生变化,就像布帛纸张取代竹简一样,电子载体取代纸张、电商渠道取代实体店店面乃大势所趋。只是,寄托于

书籍和报纸上的微妙感觉,传统售卖渠道中的中小业者,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受到冲击,更多是扮演一种悲情角色。文化产业传统业者的悲情,在好莱坞电影《电子书》中有很好的演绎。一家街角书店受到网络连锁书店的冲击而面临倒闭,女老板凯瑟琳·凯莉在网上向男网友乔·福克斯倾诉衷肠,而她的这个男网友正是那家连锁书店的老板。网络上的友情已经升华为爱情,现实中的商业竞争关系却分出了胜负。当然,电影的结局是非常美好的,找到了大款丈夫,凯瑟琳的生计不会存在问题,只是千千万万的街角书店恐怕难逃厄运了。在新的业态和渠道的冲击下,传统业态已被冲得七零八落。在纸质媒体的黄金十年,各地的报刊亭如雨后春笋。以北京为例,1999年以前有

1000多个散报摊,1999年北京市政府开展“为老百姓办实事”项目,报刊亭建设列入其中,奥运期间报刊亭数量达到了高峰,总共有2500个。这个数字,可能再也无法突破了。我曾经为了买一期发行量上百万份的报纸,在北京走遍了方圆几公里的报摊,竟然一无所获。随着纸质媒体发行量的下降,报刊亭的主要功能已经不是售卖报刊,除了多了几份拥有惊爆明星照片的时尚刊物之外,报刊亭跟杂货店没啥区别。非常遗憾,报刊亭身上的文化印记基本消失了。从这个角度看,似乎不难理解北京朝阳区72家被强拆报刊亭的命运。据报道,日前北京有72座报刊亭被强制拆除,而且速度快如闪电,中午口头通知,深夜就派人拆除,没有给亭主任何文件依据,也没有说明缘由。网络上流传的拆除现场照片显

示,执法过程中有些冲突,亭主如果反抗,就会被拘留。执法部门强拆报刊亭,当然不是为了让产能过剩的文化市场尽快出清,而是从规范市容市貌角度出发。朝阳区政府事后也否认拆除报刊亭,根据首都环境建设委有关要求北京市报刊亭设置规范,朝阳区对部分区域的报刊亭集中开展整治工作,依法移改不符合设置规范报刊亭,其中改、移71处,规范1处。看到这些报刊亭的遭遇,作为纸媒从业人员,难免有兔死狐悲之感。但听到朝阳区政府的解释,心里有了一些宽慰,不管报纸卖不卖得出去,72座报刊亭的生计算是暂时保住了。另外还想着借纸媒从业人员的便利奉劝执法者,无论法律依据多么坚实,执法过程都要尽量柔和。(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缘木求鱼】

如果不下大力气把民众的付费习惯建立起来,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就很难建立。

# 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建立不易

木木

上周六凌晨1点多,我去机场接朋友。从距离机场高速收费站差不多500米的地方开始,熟悉的景象又如约而至,在路侧应急车道上,各式各样的轿车,踏踏实实地停着,中间虽有间断,但却很韧性地一直延续到机场停车场前二三十米的地方。这些车也是去接人的,但司机们的头脑显然都经济得很——为了免于停车场的“盘剥”,就把车停在应急车道上,耐心地等等,直到手中的电话响起被接者的铃声。不过,此方法虽然好,许多时候却免不了受到警察叔叔的打搅;但没关系,办法总比困难多,“叔叔”一来,马上发动汽车、佯装前

行,“叔叔”一走远,继续排队静候之。一路扫视过去,安静地停在路边、耐心等着接客的车主,绝大多数都看着相当的体面。买得起几十万轿车的人,仍能在区区几块钱的停车费上精打细算,也足见市场经济的观念早已渗入其血液,覆盖其心田并每每时刻指导其行动了。不过,为了少花几块钱,即使违法也在所不惜的小算盘,显然打得不是地方。但这样的小算盘无时无刻不咄咄逼人地拨动着天动地,也足可让人得窥现实的真面貌。于中国人而言,在某些东西上,是极舍得花钱、极慷慨大方的,而在另外一些东西上,却又吝啬得很,试着归纳总结一下,大约凡是能够提升自身外在新鲜度并与其他人形成区分或引逗得他人羡慕嫉妒恨的东西,几乎早晚都

能成为被追逐的对象,而没有这些功能的东西,为之掏一个子儿,都值得斤斤计较一番,甚至违犯法律、冒天下之大不韪地计较,也值得试一试。比如,开着几十万、上百万甚至几百万的“世界名车”,在车流滚滚的大街上,叫嚣而来、呼啸而去,大约就很容易促使大脑分泌一种愉悦物质,让人以为自己就是太阳系的中心。为了这种感觉,当然花多少钱都值得。而拦在车头、为了有争议的5分钟执意要多收2块钱的收费员,当然就很招人待见,为了这2块钱,好好争执半个小时、甚至为此动一动手脚、撞一撞人,大约也就有了理所当然的价值。这样的心理,以及在此心理支配下产生的行为,似乎充斥着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无论什么,一旦充斥的时

间长了,自然就成了习惯,甚至成为天雷也难打动的规矩。在这样的环境下,许多事情办起来、推动起来,就真的像“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比如,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的建立。在证券时报的专栏里,沈凌先生认为,“偷窃”是新媒把纸媒逼上死路的法宝;只有重建知识产权的保护机制,纸媒才有并非暗无天日的未来,我们的社会也才可能有技术的创新和物质的丰裕以及精神文明的进步。所言不谬。但不讲“偷窃”,大概真的会让人——偷窃者和被偷窃者——很难受,生活或许也要因此失去许多“偷窃”的乐趣吧。现实是,目前似乎并非新媒在主动“偷窃”纸媒,更多的是,纸媒“心甘情愿”地争着被新媒“偷窃”——一旦被“偷窃”得少了,心里还格

外得难受呢!当“偷”与“被偷”,不花费或少花费成为绝大多数人生活中获取某类东西时的习惯,那么,有人吵吵着“知识产权保护”,听起来似乎就格外地不和谐。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建立起来,殊为不易。这里既存在法律法规、执法守法方面的问题,但更多的还涉及民众心理、社会意识方面的问题。如果不下大力气、采取多种措施把民众的“付费”习惯建立起来,尤其是为“身边人”提供的服务付费的习惯建立起来,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的建立,就难言取得根本上的成功。而没有这样的机制,纸媒、新媒大约就会是“一根儿绳儿上的蚂蚱”,不但两者没前途,而且整个社会的前途也光明不到哪里去。(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儒林经济】

在严贡生时代,酒席像其他物品一样是可以随身携带的。

# 酒宴是一种财富

王国华

上世纪80年代,我的语文老师刘朝晖跟我聊天时曾感慨农村之人情越来越淡漠:“原先,在村子请人吃饭,是件多隆重的的事儿啊。请人的和被请的一定不是一般关系。过了多年双方还会记得这事儿。你看现在,随便几个人就凑一块吃一顿,第二天谁也不认识谁了。”我对此深有感触。因为我记事时正好赶上“隆重”的小尾巴。每当家里来客人或者发生重大事情,偶尔请人来吃饭,一般提前两三天就要开始准备。在客人到来之前的那个上午,大人们有时还要找亲友邻居来帮忙,七七八八的人一直忙到开饭。他们仿佛不是置办一桌酒席,而是在精心

打造一件物品。现在回忆起来,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炒土豆丝、煎带鱼等。但细数每一盘每一碗,都是平时舍不得吃的东西,众多食材都非常奢侈地集中在一起,主人公有点手足无措,非得多找些人帮着忙活,心里才踏实。在中国几千年的农耕社会里,粥、饼、咸菜才是千家万户朝夕相伴的主食。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这种情况似乎都没改变。在他们心中,酒席是另外一个种类——财富。《儒林外史》中,姜三姜四两位公子路遇鲁编修,鲁编修说,我今早到那边镇上去看一个故人,他要留我吃饭,我因家中有事要匆匆返回,苦辞了他,他就将一席酒肴送在我船上。正好喜

遇着二位世兄,一起把酒话旧吧。由此可见把酒席当礼物送人,古已有之。后唐明宗天成二年,诏命施行新科进士闻喜之宴,年赐钱四百贯。宋太宗端拱元年规定由朝廷为新科进士置办宴席,遂为惯例。野史笔记中记载,乾隆皇帝过生日的时候,自称“奴才”的满族贵族、作为臣子的汉人以及宫内的太监们,纷纷献礼,有送如意的,有送各类珍玩的,还的几个人凑一桌酒席送上去。按说皇帝肯定不能真的坐在桌前拿起筷子吃。再说,大家送那么多酒席他也吃不过来啊。而作为一种相对贵重的物品,皇帝可以将酒席转赠给臣下。臣下带回家热热就可以吃。《儒林外史》第四回中,严贡生听说汤县令的客人范进和张静斋正在关帝庙

内,赶紧去拜访,并让人收拾了一个食盒来,揭开盒盖,九个盘子,都是鸡、鸭、糟鱼、火腿之类。又捉了一瓶酒,放在桌上。严贡生请两位先生入座,斟酒奉过来,说,本该请二位先生降临寒舍,但一来蜗居窄小,二来怕耽误了二位的行程,故此备个粗馐,在这里边吃边谈。可见在严贡生时代,酒席像其他物品一样是可以随身携带的。早先,孔子的学生孝敬老师,送一条干肉,就是很不错的、完全拿得出手的礼物。很长一段时间里,官员的工资也是用粮食替代,月薪不是多少银钱而是多少石粮食。而酒席作为粮食的豪华呈现方式,当然是送礼佳品。不仅是酒席,就是吃酒席之后剩下的食物也算作财富之一,可以郑重

送人的。我小的时候,谁家操办完红白事后,住家往往把剩菜进行整理组合,比如把剩肉装进一个盆里,把类型相同的蔬菜装进一个盆里,然后一碗碗盛好,挨家挨户送给乡邻。这些剩菜有一个好听的名字:“折箩”。我老家在河北,离北京不远。《北京土语辞典》解释“折箩”为:“酒席吃罢,剩下的菜肴,不问种类,全倒在一块儿……也叫‘折箩菜’。”送折箩也是个大事,住家若疏忽,落下了某位邻居,人家会记恨的。现在想来已经不可以想象,谁还敢把剩菜送人,你把剩菜送人,人家一定要生气。短短几十年,世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作者系深圳作家)